國家發展研究　第八卷第二期
2009 年 6 月　　頁 55-88

# 中國政治思想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發展概況

葛　荃*

收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13 日　　接受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

* 作者簡介：葛荃（1953～），安徽巢湖人。“文革”時爲“老三屆”，插過隊，做過工。“文革”後以“七七級”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書，嗣後在南開大學政治學系任教。現爲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術業專攻：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文化。迄今出版專著四種，主編參編著作、教材 19 種，發表學術論文 70 餘篇。代表作：《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政德志》、《中國政治文化教程》、《立命與忠誠》、《權力宰制理性》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摘　要

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爲一個獨立的學科始建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迄今已有近百年的發展。本文敘述了這一學科的建立與發展歷程；並以方法論作爲劃分參照，將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群體區分爲三個流派：即“新學歷史學”流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現代政治學流派，又舉出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爲梁啓超、呂振羽和蕭公權等；最後，從更新研究方法和開拓研究領域兩個角度爲這一學科在 21 世紀的發展做了前瞻性的評估。

關鍵詞：中國政治思想史、新學歷史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現代政治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壹、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建立

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淵源當上溯至二十世紀初。一九二二年，梁啓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自序道：

> 啓超治中國政治思想，蓋在二十年前，於所爲《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常作斷片的發表。雖大致無以甚異於今日之所懷，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1]。

自一九〇〇年之後，梁啓超已經開始把中國政治思想作爲一門學問來進行研究。不過在這一時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尙屬鳳毛麟角，梁啓超本人亦僅作“斷片的發表”，顯然此時還沒有學者對中國政治思想史進行專題的思考，更沒有人進行總體的把握。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尙處於探索階段，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建設則屬於草創而未就。

根據現有的相關資料來看，經學家孫詒讓曾著有《周禮政要》一書，主要從政治認識的角度，把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比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觀念。不過從總體看，卻並不屬於政治思想史研究。孫著雖然早于梁氏之書，卻不能以此作爲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開端。

據上，我們可以斷言，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的建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根據有二：

其一，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爲一門學科，被列爲課程，搬上了課堂。據載，一九二二年，梁啓超分別於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及東南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

---

1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 1936 年版，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二，有兩部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專著問世。一是謝無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於一九二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二是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於一九二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後者的書稿完成時間是一九二二年。梁書中的“序論”部分對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研究的內容及資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作了詳細的闡述。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已經開設了“政治思想史”課程，由高一涵講授。嗣後，清華大學也於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開設了“政治思想”課程。這些課程的名稱只是標明“政治思想”，卻沒有說明是“中國”還是“外國”。鑒於高一涵本人著有《歐洲政治思想史》；而清華大學在一九三二年以後，添設了有關“國情”的課程，其中明確設置有“中國政治思想”。據此我們可推知，北大、清華於二〇年代開設的“政治思想”當指“西方”或“外國”，而非“中國”。

梁啓超、謝無量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建設中有首創之功，篳路藍縷，不可埋沒。

# 貳、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發展

## 一、本世紀初至四〇年代

自從梁、謝諸君以後，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有了長足的發展。從課程的設置來看，南開大學於一九二八年，中央大學於一九二九年，北京大學於一九三一年，清華大學於一九三二年分別在政治系設置了“中國政治思想”課程[2]，表明這一學科有了初步的發展。

[2] 見《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版）中蕭公權《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中央大學檔案》卷宗號 648，案卷號 2290，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研究狀況來看，這一時期出版了多種以“中國政治思想史”命名的專著，主要有：

1. 陳安仁《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二年版）；
2.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書局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版）；
3.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絜明書店一九三七年版）；
4.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
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國立編譯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版）。

這些論著的出版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一、改變了梁啓超偏重古代，甚至偏重先秦的研究局面，這些學者的研究視野擴展到近現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思潮，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至今仍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例如，蕭公權對章炳麟政治思想的研究，陶希聖對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研究，直到現在仍然被一些學者作爲一家之言而多次列舉徵引。

其二、這些專著在不同層面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例如，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歷史分期進行概括，他把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分爲四個時期：

> 創造時期，孔子降生（西元前五五一年）至始皇統一。
> 因襲期，秦漢至宋元。
> 轉變期，明初至清末。
> 成熟期，三民主義成立以迄於今。

且不論這一分期是否合理，僅就這種研究本身來看就是很有意義的，

碼 22，《各院系學程設置內容及有關文書》；《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大出版社 1988 年版），《清華大學校史稿》（中華書局，1981 年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表著這一時期學者們在對中國政治思想史進行全面把握的努力。

又如，楊幼炯概括了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徵，曰：神權主義、以家旅爲本位、民本主義。如果我們將這一認識與梁啓超的概括相比照，我們就會發現，楊幼炯的概括較之梁氏的“世界主義、民本主義、社會主義”更顯帶有中國文化的特色，顯得更有說服力[3]。

其三、這一時期的研究還形成了一些學術上的共識。例如梁啓超、楊幼炯等都認爲，民本主義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徵。我們可以這樣說，民國時期的大多數學者都贊同以“民本主義”作爲傳統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徵；而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爲，民本主義橫亙古今，而孫中山則是民本主義的集大成者。這種共識的達成，標誌著研究者們的思維深度，體現了研究者們從全局著眼的治學路向。

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早期研究儘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茲舉如下：

一是重古輕今的問題依然存在。學者們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了古代的政治思想，尤其看重諸子之學。可是一涉及到近現代，研究者大多僅述及康有爲、梁啓超、章炳麟和孫中山等人，對於林則徐、魏源、太平天國以及洋務派的政治思想或忽略不計，或一帶而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客觀的歷史現象所致，古代歷史時期長，政治思想豐富，遂用力較多；對於當時學者而言，如今我們說的“近現代”實爲“當代史”，時期短，政治思想內容有限，故而用功不足。另一方面則因爲“當代史”的資料難以收集，因此很難進行詳細研究。

二是對各個時期政治思想的特徵研究用力不夠。例如，多數學者認爲民本主義是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總體特徵，然而民本主義形成的歷史過程有什麼特點？在古代、近代和當代等各個時期，民本主義又是如何表現的？除了民本主義外，各個朝代和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是

[3] 這時的蕭公權、楊幼炯尚在中國大陸，故這裏用爲例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否另有特色。舉例言之，“華夷之辨”是傳統政治思想中用以辨析和調節民族關係的專門之論，在某些時期論者寥寥，而在元朝、明初和明末清初卻成爲思想的焦點。另外，一八四〇年國門洞開之後，如何面對新型的民族衝突和國際關係？近代中國由於列強入侵和民族危機的加劇，抵禦外侮與學習、趕超西方強國成爲時代的主題。對於這些問題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和表現，當時的研究者顯然沒能重視。

此外，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社會政治環境也很不利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發展，主要有三：

其一，頻繁的戰亂使整個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在戰亂和動盪中飽受奔波之苦，知識份子的良知又令他們時時感受著國破家亡的危機感，學者的靈魂不能平靜，精神不得安寧，這讓他們很難靜下心來作研究。再加上學校和研究機構經常受到遷徙或其他形式的干擾，正常的學術氛圍和工作秩序常常被打亂，客觀上也使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受到影響。

其二，政治學專業教師與政界的聯繫過於密切，對於學科的發展有某種牽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政治思想史。當時高等院校政治學專業教師大多與政界有著緊密的聯繫，教師棄教從官和政府官員退而爲師成爲當時政治系的一大“時尚”。例如，清華大學政治系的教師“其中不少曾在政府任職，或在以後進入政府任職”[4]。朱家驊曾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增刊”發佈《啓事》說：“我們去年請好幾位名教授，走到半路，被政府拉去做委員、做法制局長，我們哪有和政府競爭的力量呢？”[5] 顯見這種情況是十分普遍的，以至當時有人戲稱、大學的政治系爲“升官系”、經濟系爲“發財系”。政治學系的教師及學生過於應世，與政府的聯繫過於緊

4 《清華大學校史稿》。

5 《中山大學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年版，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密，介入了實際政治活動和權力之爭，必不能專心從事政治學研究。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作爲政治學的分支，中國政治思想史自然也不可能倖免。

其三，這一時期的主流學術思潮是輕“中”而重“西”。伴隨著西學東漸，學術界的主要傾向是批判傳統文化，向西方學術尋求解救國難、解除危機的真理。具體到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一方面，“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孔思潮影響著人們對於中國政治思想應用價值的重視；另一方面，政治學本身就是“西學”的現代學科。當時各高等院校政治系的教師又大多有著留學的經歷，崇拜西學。這樣一來，在中國政治思想與西洋政治思想的碰撞中，前者在經世致用方面自然稍遜一籌，只能處於劣勢。因此，當時的學者比較注重“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輕視“中國政治思想史”。許多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早在二〇年代初期就開設“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6]，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設置則遲至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而且，“西洋政治思想史”在開設之初即被列爲必修課，而“中國政治思想史”則除了中央大學之外，其餘高校皆爲選修課。

一九二九年，蕭公權在南開大學同時開設“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根據他的體會，由於這兩門課程的研究程度不一樣，因此備課的難易程度也大有區別。他說：“‘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準備起來比較容易，但仍需要一些時間去整理。‘中國政治思想’沒有現成的教材，必須全部搜輯編排”[7]。由此可知，鑒於學術積累的不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發展也會受到影響。

6　見《北京大學校史》，《清華大學校史稿》。

7　蕭公權《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一九四九年至今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形成了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致使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命運與學風均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就大陸而言，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命運大致以“文化大革命”爲界，可以劃分爲前後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大陸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學系，“中國政治思想”作爲其中一門課程列入其中。一九五二年，全國各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由於種種原因，取消了各高校的政治學系建制。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基本終止了。政治學專業的教師和有關研究人員大多改行從事其他工作。

此後，一九六〇年，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三校恢復了政治學系，但爲時不久，即都改爲“國際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爲：民族解放運動、西歐北美政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學科建制和課程設置方面並未涉及到中國政治思想史[8]。總之，在這一段時期，學術發展與全國的政治形勢始終保持一致，學術研究與其他各項工作一樣，一切都是爲了革命與政治的需要，據此，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命運可以想見。

與此相應，在這一階段，有關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術論文和論著都比較少，而且，這些論著絕大多數屬於歷史學科，學術觀點受到流行的政治教條主義的極大影響。探討思想家本人及其思想的階級性成爲論述及評價的中心問題，“文革”時期風行一時的“儒法鬥爭”則把這種學風推向了極致。

**後一階段，**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

---

8 見《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系史》，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文革”被否定和“改革開放”發展方向的確立，思想解放成了時代潮流。知識份子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醒來，迎來了學術發展的撥亂反正，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新階段。伴隨著批判“四人幫”和恢復高考制度，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教學、研究工作基本恢復了正常。這一時期，全國各個綜合性大學紛紛恢復政治學系，中國政治思想史終於得以恢復名譽，成爲政治學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此外，由於中國政治思想史學術領域的特殊性，一些高校在歷史系或黨史系也紛紛開設了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

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起始，在大陸學術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從研究方法上看，儘管大多數學者仍然以馬克思主義學說作爲最主要的方法論，用來分析、研究歷史上的各種政治學說，不過，研究者們已經有意識地試圖從長期束縛和困擾人們頭腦的政治教條主義中走出來，研究者們對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論述和評價已經不再僅僅局限於階級分析或階級鬥爭，人們開始辨證地、唯物地看待歷史上的思想命題和思想家，力求在研究中保持客觀、冷靜與理性。

其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物件得到重新界定。梁啓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即從兩個層面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內容進行了歸類。一是從“所表現的物件”來劃分，可分爲“純理”和“應用”兩類；二是從“能表現之主格”來區分，可分爲“個人的思想”和“時代的思想”。梁氏的概括其功在首創，但太過於籠統。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物件成爲學者們率先思考的研究課題。提出具有代表性觀點的學者有徐大同、陳哲夫、謝慶奎、朱一濤、劉澤華等。徐、陳、謝、朱等人在其合著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裏指出：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物件是：歷史上各個階級和政治集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對社會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組織以及各階級相互關係所形成的觀點和理論體系；各種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間的鬥爭、演變和更替的具體歷史過程；各種不同政治思想對現實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又說：

> 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個階級對待國家政權的態度和主張，即關於國家的產生、性質和作用，以及如何維持國家政權的理論觀點和政治主張[9]。

劉澤華在上述認識基礎上又有所拓展，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中國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國家和法的理論”之外，其他一些內容也應列入它的研究範圍。例如關於政治哲學問題，關於社會模式的理論（理想國的理論），治國的方略和政策、倫理道德問題，關於政治實施理論以及政治權術理論等等[10]。這些認識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史學術論域的開拓和推動研究起到了引導定向的作用。

其三，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斷代史研究更加深入，除了有大量的學術論文發表，還屢有專著問世。這段時期，學者們對古代、近代和現代的政治思想都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1. 徐大同等編著：《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 劉澤華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

9 徐大同等編著，《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頁 2-3。

10 劉澤華，《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劉澤華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4.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5. 邵德門主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6. 熊月之著：《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7. 劉健清等主編：《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8. 林茂生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9. 李世平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10. 彭明著：《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十講》（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其四，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理論結構或價值分析形成了一些深刻的認識，有些觀點極具概括性。

例如，劉澤華認爲，王權主義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11]。熊月之對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發展的概括是：一條特殊邏輯：中國民主思想進程是“一開始就從政治制度著手，先提出立憲主張，而後才出現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議會制度──自由平等這樣一條恰好與歐洲相反的邏輯”。兩個否定過程：“第一個否定過程，民主共和──君主立憲，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對專制由空想轉向現實的飛躍”。“第二

[11]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序言”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否定過程，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標誌著中國人民對封建清朝幻想破滅，轉而覺醒的飛躍”[12]。這些都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這一階段的研究取得成果的同時，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其一，在方法論上仍然比較單一，研究者們在政治學方法論的運用上仍然不夠充分。八〇年代以後，研究者們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擺脫政治教條主義的束縛，但是方法論的轉換並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在闡釋和分析政治思想的方法論上，階級鬥爭學說仍然占了相當的比重。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理論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國外學術界的一些先進理論和方法也逐漸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給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論借鑒。但是，總的來看，對於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視不夠。尤其在如何將外國的現代理論作爲方法論，然後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一問題上，顯然努力不夠，成就不多。

其二，通史性研究不夠重視，沒有出現標誌性的研究成果。迄今爲止，研究者大都比較注重專題、人物或斷代史研究，在這些方面可謂碩果累累。然而，至今幾乎沒有一本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通史性學術專著，只是於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九年，分別由朱日耀和曹德本編著了兩種教材，在時間斷限上延續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但其後的政治思想發展仍然付之厥如。基於這樣一種實際狀況，學者們在研究中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總體把握的深度仍顯欠缺。特別是涉及到政治思想的轉化、融合，以及在歷史變動時期的政治思想轉型等問題，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界至今拿不出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這些問題均有待於學術界的繼續努力。

[12]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頁 20、2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參、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流派分析

由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發展的迭宕起伏，一波三折，近百年來，這一研究領域固然出現了眾多學術大師，卻沒有能夠形成得到學術界公認的明顯的學術派別。如果我們把學術派別的形成視爲學術發展深化的標誌，那麼，學術派別不明顯正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夠發達的證明。不過，儘管如此，在近百年的學術發展歷程中，如果我們以方法論爲參照，大體上還是可以區分出不同的流派。當然這種劃分只是爲了有助於今人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百年歷程有著更爲清晰的認識，並不說明這是學術界既有的共識。

比較而言，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派可以歸納出三種：新學歷史學流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現代政治學流派。下面分而述之。

## 一、“新學歷史學”流派

如前所述，中國政治思想史肇源於二十世紀初葉，其時國家動盪不甯，文化及學術發展亦處於新舊交替而紛雜不一。這一時期，西方的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已經流入中土，對於中國學者的理論方法正在形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雖說這一時期能真正借鑒西學，並且用於實際研究者爲數不多，但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仍然有不少學者在承繼了傳統的史學方法的同時，亦不同程度地吸納了東漸而來的西學，典型者如梁啓超、楊幼炯等。

梁啓超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就提出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問題，並且進行了專門論述。他認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法有三種：

第一，問題的研究法。這種方法是“先將所欲研究的事項劃出範圍，擬定若干題目，每個題目，皆上下古今以觀其變遷……此法長處，能令吾儕對於各種重要問題，得有縝密正確的知識，而且最適於實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用。其短處，在時代隔斷，不易看出思想變化之總因間因，且各問題相互之關係，亦不明了”。

第二，時代的研究法。“此法按時代先後順序研究。例如先三代次春秋次戰國次秦漢……等。在同一時代中，又以思想家出生之早晚爲次……此法長處，能使思想進化之跡歷歷明白，又可以將各時代之背景──即政治實況及社會實況──委細說明，以觀思想發生的動機。其短處，則同一時代中或資料太多，對於各問題難於詳細敍述……又一派之學說先輩與後輩年代隔離，令讀者迷其脈絡所在”。

第三，宗派的研究法。“此法將各種思想抽出其特色，分爲若干派”進行研究。“此法長處，對於一學派之思想淵源──其互相發明遞爲蛻變及大派中所含支派應時分化之跡，易於說明。各派對於具體問題所主張，亦易於比較。其短處，在時代隔斷……對於思想進化次第，難以說明。又各派末流相互影響甚多，歸類難以正確。又數大派之外，其有獨立思想而勢力較微者，容易漏略。”[13]

其後，楊幼炯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法也進行了探討，認爲其法有三個層次：

首先，研究政治思想之時代背景，“即政治思想產生之時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背景”。包括政治制度、實際政治情況、政治動向，生產方法的變化等等。

其次，用歷史的比較方法，以研究政治思想之變遷；

最後，研究各個思想家的個性[14]。

楊幼炯還提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記述方法亦有三種：一、編年體，以年代爲區別。二、列傳體，以每個思想家爲敍述之主題。三、

---

13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36，（中華書局和上海書店於 1986 年根據 1936 年的版本複印並聯合出版），頁 12-14。

14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年影印，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說體，以每種學說爲論題[15]。

不言而喻，上述列舉中已經注入了一些新的觀念。如梁啓超的問題研究法，採用的邏輯分析的方法，與單純的編年史相比較是有新意的。楊幼炯注重思想的時代背景，認爲“蓋政治思想之實現恒結晶以成爲一種之制度。故政治制度，比與其時代之要求相適應，此即彼時代政治思想之表現也”。“在經濟方面，生產方法之變化，引起一切社會關係之改變。人類社會組織之歷史的進化，完全由於生產方法之變更而進化。故一時代之經濟狀況，實與彼時代之政治思想以至大之影響，而社會生活、風尙、習慣對於思想，亦有至深切之關係。凡此種種皆爲時代之背景”[16]。這樣的認識顯然已經具有了近代學術的內容，研究者已經關注到經濟、政治制度、生產方式、社會生活、社會關係等等與思想的關係。與傳統學術相比較，近代學術研究的時代印痕是十分清晰的。

不過，我們一旦深入他們的研究本身，流覽於字裏行間，就會發現，他們實際採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爲主。他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注重歷史資料的考訂鉤沉，熱衷於梳理史實，通過歸納思想的師承脈絡、變化融合，來給思想或思潮訂正流派，概括特點和評定意義。一般而言，這一流派並不注重運用現代學術理論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進行理論分析，他們的分析框架和理念基本沒能走出傳統的史學語言模式，具有明顯的新舊學術相結合的印記。由於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術過渡性質，因而在很長的時期內被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們普遍採用，“新學歷史學”學派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與大陸兩分，臺灣學術界

---

15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年影印，頁 3-4。

16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年影印，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方面明顯與大陸不同。臺灣地區的學者們主要繼承了梁啓超、蕭公權等人的研究路數，以傳統史學研究法爲主，同時雜以西學。這就是說，“新學歷史學”流派於五〇年代以後，實際在臺灣學術界得以延續和發展。在方法論上注重歷史內涵，長於歷史資料的挖掘排比，在理論分析的深刻程度上未能十分突出。

## 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

二十世紀初葉，以“新文化運動”爲主要標誌，中國文化的發展進入劇烈變動時期。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時期伴隨著諸多西方學術和政治思想而流入中土的，一些先進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作爲一種新型的方法論引起某些學者的興趣，並且實際運用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呂振羽。

呂振羽在一九四三年修訂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導言”中即提出：“我們對於歷史上某一時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第一重要的，須要正確地掌握這一時代的經濟情況和政治情況，正確地明瞭這一時代的生產方式，以及其矛盾之發展的根本形式。……在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的自身雖屬原則地受著社會存在所決定，然其對於社會存在自身亦能給予反作用，而給其發展過程以多多少少或正或負的影響，從而又影響其自身”。這種認識顯然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其後，在一九五五年的《修訂版再版代序》中，呂振羽講得更爲明確。他遍引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等革命領袖的語錄，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斷言：社會思想、意識依存於社會存在；而社會存在總是先行的，思想、意識的產生或變革常常落後於社會存在。”[17] 他又徵引毛澤東“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

[17]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上冊，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烙印”[18] 的語錄，強調思想的階級屬性。

進入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在中國大陸，由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科歸屬被推給了歷史學，史學方法的採用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與前期側重傳統史學方法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研究者們普遍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作爲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同時，這也成了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要方法論。研究者用於評判思想性質的標準是“階級性”，思想家的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思想家之思想是爲哪個階級服務的等等成爲研究者們必須採用的認識手段。思想的合理與否往往取決於這種思想是順應了歷史潮流還是相反，是推動了歷史的前進還是形成了阻礙，以致成爲“反動”的思想。在這種研究方法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覆蓋了中國大陸。這一時期的代表巨著是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等撰著的 5 卷本《中國思想通史》。雖說這部著作不是政治思想的專門著述，不過其中包含了相對完整的政治思想研究，其論點亦有代表性。全書貫穿著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階級分析方法亦成爲這部著作的主要方法論。例如。《中國思想通史》分析孟子的“階級論”，認爲：“孟子的階級立場是很明顯的。他不主張在貧富關係上破壞已往的階級制度”；“孟子對於階級關係的變化，抱著反對的態度，對於舊貴族卻具有強烈的同情心。”[19]

總括而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方法對於促進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出帝制時代傳統史學的局限，進而走向近現代史學，促進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科學性，關注史學研究的當代意義等方面都是很有價值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由於

訂版再版代序，頁 11。

18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上冊，修訂版再版代序，頁 15。

19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一卷，頁 386、3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實際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傾向，中國學術界受到了當時瀰漫全國的教條主義思潮和階級鬥爭極端化的極大影響，肇源於“新文化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也逐漸趨向教條化，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漸變得僵固和公式化，致使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的發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上述這種曲折發展道路的典型表現是，大陸的學者們事實上已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方法論所要求的辯證和唯物地研究問題的科學性，反而簡單地套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階級二分”等教條公式，用階級鬥爭解釋一切思想文化現象。這種學術傾向的普遍化和極端化，必然使得中國政治思想史極爲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內涵被簡化爲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文化表像，思想成爲階級鬥爭的派生物，思辨的科學分析與理性思維被置換爲背離思維邏輯的政治公式和政治推演。

到了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中期，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已經絕對化了的階級鬥爭則被進一步簡化爲“儒法鬥爭”，在“政治掛帥”的指引下，學術界要用“儒法鬥爭”重寫中國歷史，學術研究實際成爲政治鬧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已然面目全非，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科學研究也根本無從談起。這種情況一直到了八〇年代初期才有所改觀。

進入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得以恢復，大陸學者在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政治動盪之後，開始深入反思教條主義的教訓與危害，有些富於學術個性的學者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對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種現象可以被視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的新發展。

例如，劉澤華在其專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即指出，對政治思想史應該像廣角鏡那樣，從多方面著眼，用多頭並進的方式開展研究。就研究的體例方面，劉著認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需要進行的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進行列傳式的研究。這種個案式的方法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式之一，屬於基礎性的研究。其次，要進行流派研究。從思想史看，只有形成流派的思想，才能把人的認識推向深入，才能構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政治思想流派對歷史的影響比之個人要大得多，理應成爲研究的重點。再次，要開展社會政治思潮和一個時代重大課題的研究。此外，對於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範疇，各種政治思想的比較，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的關係等等進行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就研究的理論方法而言，劉著的認識顯然走出了教條主義的圍欄，提出“一方面要注意學科自身的認識規律，循序漸進；另一方面還要借鑒思想史和哲學史研究的經驗與教訓”。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於描述思想內容和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同時還要考察思想的價值。在這裏，關於政治思想的價值性認識和是非判斷性認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關於價值性認識，劉著認爲：“爲了判明一種思想的價值，首先要明確價值標準。……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但經驗告訴我們，在實際運用中，卻又表現爲千差萬別，比如，同是一個孔子，有的認爲他是反動派，有的認爲是革命黨。在兩種極端認識中間，還有一個廣闊的餘地，……價值問題不只是個階級定性問題，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內容。政治思想史不作價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會變成一筆糊塗帳。爲了更好地判明各種思想的價值，應該探討一些價值標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借助歷史學中已獲得的成果，又要結合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情況，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標準。”[20] 關於是非判斷性認識，劉著認爲：“從哲學上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人所共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把這條原則用於政治思想史，就產生了許多節枝。”在劉澤華看來，在歷史上，一些代表剝削階級的政治思

[20] 劉澤華，《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想付諸實踐，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進歷史的作用”。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真理與謬誤該如何分辨，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政治思想中有否科學和真理？實踐證明是可行的，起了積極作用的思想是否就是實踐檢驗證明了的真理？人民美好的，但不能付諸實踐的政治願望，與真理是什麼關係？凡此種種，是急需討論的問題”[21]。劉著提出的問題對於打破思想的堅冰具有重要的衝擊意義，代表了思想解放的時代，大陸學者關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思維。

以劉澤華爲代表的一派學者，在學術認識上承襲了本世紀初葉“新文化運動”的反思精神與批判意識，他們站在現代化理念的立場上，對覆蓋了數千年君主政治的傳統政治思想與文化進行了批判、反思和啓蒙。這類學者多數具有鮮明的學術主體性，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中的“反思學派”。

從總體來看，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大陸學者在繼續馬克思主義指導方法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同時，更加注重在傳統理論方法上的更新，從而使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開拓出一片新天地。

## 三、現代政治學流派

鑒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理特點，史學方法其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從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則無一不標誌著史學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成功的運用。然而，如果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只是局限于史學方法，則又意味著某種缺陷。這一學科的政治學品性已經表明，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如果缺少政治學的方法，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則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已經有研究者比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點，

[21] 劉澤華，《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採用了史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蕭公權。

蕭公權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如其自敍，就是“采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敘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22]。例如蕭著論孔子：“孔子政治思想之出發點爲從周，其實行之具體主張則爲‘正名’。以今語釋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之謂。”[23] 又如，蕭著論晚明黃宗羲：“梨洲貴民之古義，不啻向專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擊。使黃氏生當清季，其爲一熱烈之民權主義者，殆屬可能。然而吾人細繹待訪錄之立言，覺梨洲雖反對專制而未能衝破君主政體之範圍。故其思想實仍蹈襲孟子之故轍，未足以語於真正之轉變。”[24] 這些評析運用了權利、義務、民權、政體等概念，其評價的角度亦從民主、專制等政治學價值理念而立論，其在方法論上的政治學特點是十分明顯的。

大約正是由於蕭著的政治學理論特色，較之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研究更禁得起推敲，因而時隔五十餘年之後，多數於三〇、四〇年代問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已經退出了課堂教學，退居爲研究者的案頭參考，惟有蕭著至今仍然被海內外多所高校列爲教科書或教學參考書，其學術生命力之綿延長久，印證了蕭著的學術品性。

進入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政治學流派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在方法論上，學術界的認識也更爲清晰。一般而言，從方法的角度看政治

---

2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一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2，上冊，頁 2。

2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一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2，上冊，頁 57。

2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一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2，上冊，頁 616-6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可以分爲兩個方面，一是技術方法，另一是認識方法。

所謂技術方法是說，由於現代政治學是二〇年代“行爲主義”思潮的產物，因而在現代政治學研究中普遍運用了個案調查、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等技術手段，以期提高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認識方法是說，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包括一整套概念和命題，被研究者用來作爲認識和分析問題的手段，並據此而進行評估、做出解釋，概括意義。在中國學術界，這兩種方法都被用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過，就當前的研究狀況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與史學流派相比較，歷史學方法仍然得到廣泛的使用，運用政治學方法者尚屬個別。而且，即便運用政治學方法，一般也只是局限於認識方法，例如前引蕭公權，所謂“系政治學之觀點”，就是以政治學理論作爲一種認識方法來運用的。至於技術方法，八〇年代之前幾乎無人涉獵，之後漸有著述問世。九〇年代以來，嘗試運用者時有所見，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著。主要有：閔琦著《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張明澍著《中國“政治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不過總的來看問津者依然寥寥。

值得關注的是，在劉澤華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中，作者借鑒了“政治文化”理論，從政治價值、政治意識、政治心態等層面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某些命題進行了闡發，由於視角新穎，故而新見迭出。例如關於“漢以孝治天下”，劉著專門列有《忠、孝觀念的社會意識化》一節，分別對忠和孝進行了價值結構和行爲規定分析，然後指出：忠和孝的價值規定在認識上是相通互補的，這樣就使得人們對於君與父組成的社會政治權威在認識上形成了普遍的認同；然後，漢統治者通過強化忠孝義務觀念，對全社會的政治行爲導向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巨大的強制力。忠、孝觀念的社會意識化直接關係到某些政策方針的制定，對於漢代的政治運行具有直接的影響[25]。政治文化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劉著的借鑒可以視爲在政治學認識方法方面的一種成功的嘗試。

以上關於三個學術流派的區分只是就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概貌總而言之，其中，新學歷史學流派在三〇、四〇年代最爲活躍，可謂大師輩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流派的鼎盛時期是五〇至七〇年代的大陸學術界；現代政治學流派源起頗早，興盛卻晚，然而這一流派代表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展方向。隨著社會的現代化步履和學術研究的發展，這一流派理應成爲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

## 肆、二十一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發展前瞻

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爲一個獨立的學科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有無數的學者專家爲了這個知識領域的形成、存在和擴展付出了才智、精力、甚或是生命。他們的開創和耕耘給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社會留下了累累著述，構成了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凝重的一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大陸學術界，尚未見到“中國政治思想”方面的宏篇大作問世，但“中國思想史”領域已有捷足先登者。陳哲夫、江榮海和吳丕於二〇〇二年八月合作出版了百萬字巨著《20 世紀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這部著作名爲“思想史”，實則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力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自敘：“我們寫的這部《20 世紀中國思想史》，是以政治思想爲主要內容

[25]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頁 173-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思想史。”[26] 歷史斷限名爲二十世紀，實則貫通近、現、當代之大部分，自十九世紀末的中日戰爭直至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這部著作在研究領域的拓展、體例的編排和認識的深度上，都有特色。尤其是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思想鬥爭”，如五〇年代前期的學術批判運動、反右運動、反對修正主義等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運動與特點的論述分析，展示了這部著作的學術前沿性。

那麼，當我們回顧往昔，展視未來，延繼著先賢和學界前輩們開拓的學術道路繼續前行之際，對於這一學科，我們將有怎樣的期盼呢？

## 一、研究方法的更新

縱觀人類的文明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人們在認識上的每一次進步，都離不開認識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說，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理論模式等方面的不斷發展、變化和創新，是促使人們在瞭解、分析和理解事物方面不斷深入或推進的必要條件。這是就一般意義而言。如果具體到一個研究領域則更是如此。

從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歷程來看，在認識方法上業已經過了幾次大的轉變。從二十世紀初的傳統史學方法，發展到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方法，其間，又經歷了六〇至七〇年代的政治教條主義的發展階段；隨後，進入八〇年代，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雖然不很明顯，但是已經有學者將現代的政治學方法、心理學的方法或政治文化的方法運用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這種趨勢在我們看來是極爲令人振奮的，因爲這裏孕育著認識的提升和知識的創新。在我們看來，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必然要與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的。

---

[26] 陳哲夫等，《20 世紀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 政治文化方法

政治文化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研究領域。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加·阿爾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一個民族長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價值、政治知識、政治觀念、政治意識、政治信仰、政治心理等等。這一學科領域與政治思想史十分接近，但又有不同。

主要區分是，政治思想史關注的是思想家或政論家們的政治理論，亦即他們經過理性思考而後形成的政治理念或理性認識。政治文化的研究面向則更爲寬廣，既關注人們的政治理念，同時也關注人的政治知識狀況，所具有的政治價值結構，持有的政治態度或擁有的政治信仰等等。將政治文化作爲一種“方法論”引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能在原有的研究層面上深入一步，深入到思想家們的政治理念的深處，介入到他們的精神或信仰世界的內裏，對他們提出的政治理論進行價值層面、觀念意識層面或信仰層面的分析。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僅可以回答思想家們的政治理論內容是什麼，不僅能對他們的政治理論進行意義評判，而且，還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思想家提出這樣的理論是基於一種理性的深思熟慮，還是基於某種情感？某種信仰？抑或基於某種價值信念？思想家提出的理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什麼樣的方式對社會形成什麼樣的影響？思想家的理論與普遍存在的社會政治觀念是什麼關係？是理論泛化爲社會觀念，還是遍在的社會觀念促成或昇華成了政治理論？這些問題顯然是傳統的政治理論方法或歷史唯物主義所不能涉及的。政治文化方法的引入和這些問題的提出，顯然意味著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在認識層次上的加深或擴展。

(二) 政治心理學方法

政治心理學是現代交叉學科，它既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又隸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研究領域有寬狹之分。從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相聯繫的角度看，領域的界定應該是後者，即研究一個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以及關於政治的心理直感和慣常心理狀態等等。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群體的。我們將這樣的方法引入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就可以將認識的層面從一般的政治理論即理性或精神引向思想家的內心世界，作爲今日的研究者，我們就能夠不僅清楚地理解那些逝去的思想家們有著怎樣的政治理性思維，同時，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們對於身處其中的那個時代，對於政治社會環境、政治系統和種種事件、人物的情感或態度。由此，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領會到思想家們是在怎樣的心境下的政治理念，他們深邃的思想、博大的精神、和敏銳的洞察是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下養育形成的。另外，通過對社會群體的政治心理的考察，我們還可以瞭解到一種政治認識的形成與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態勢有著怎樣的聯繫，同時，一種政治理論對於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又會形成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顯然都是傳統的政治思想研究所無法包容的，也是傳統的歷史方法或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所難以解答的。

### (三) 社會學方法

作爲一個現代學科 ，社會學其實與歷史或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繫，很適合將其作爲一種方法論引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一般意義而言，社會學的學術論域覆蓋整個人類社會，大凡作爲一種社會存在的人或事物，都有必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得到解釋。政治思想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思想家之思想的形成、延續和傳播都與實際存在著的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社會道德和一般社會觀念相維繫，如果政治被理解爲一種社會現象，那麼對人們就這種現象而形成的思考做出社會學的解釋，這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曾經指出，對於一個社會進行結構性的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全可以通過對這個社會的道德結構進行研究而獲得。因爲在他看來，“每一個人的道德與其所存在的社會結構有著直接的關係”。迪氏的論斷是否合理可以另當別論，但毫無疑問的是，社會的諸種條件和因素對於一個人的道德或思想是有著內在的和深層聯繫的。把現代社會學理論作爲一種“方法論”用於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必然會使研究者的視野更爲寬廣，研究愈加深入。

總之，愚以爲，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方法的創新，而方法的創新則會受到社會科學整體水準的影響。無論借鑒哪一種方法，都會對中國政治思想史這個百年學科形成推動和促進，都意味著人類的知識領域的拓展和出新。

## 二、研究領域的開拓

方法論的創新會在認識的角度上、層次上形成多樣化，這就必然會促進研究領域的開拓。如果具體而言，以下三個方面是理應引起注意的。

### (一) 政治思想研究的哲理化

就目前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狀況來看，政治哲學已經被容括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物件裏了。在一些專題研究中，思想家的政治哲學理論也已經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有不少學術成果問世。然而，我們認爲，這只是政治思想哲理化研究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卻少有關注者，這就是對於一般政治思想理論的哲理性分析。

政治思想的理論特點是思維直觀，切近現實，思考的問題大多是屬於具有條理性或規範性的，諸如政治權力的來源與合法性，政治原則，政治策略，以及政治道德等等。研究的結果一般歸結爲內容揭示和價值（意義）評判，這種評判大多包括性質的、歷史的和現實社會的等等。至於這些政治認識在理性上、在人的思維上、以及在民族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發展上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或作用，則往往棄之而不論。當然，如果從人的思維方式來看，可以分爲感性、直觀、辯證、抽象等多種類型，政治認識的直觀性表現是完全可能的和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如果從人類的認識發展史來看，則任何一種認識的深層解析都離不開哲理性思維。也就是說，在那些條理性和規範性的認識的背後，實際蘊涵著更深厚的哲理性思維基礎，包含著更爲深刻的、更具有普遍性的認識原則，而這一切，不經過研究者的深入挖掘、抽象概括，不經過參照對比和冥思苦想是很難捕捉到的。

因此，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擴展，首先在於從政治和歷史的論域向著哲學論域的推進。運用哲學的思維方法對政治思想進行全面的檢索，研究者能夠從條理化和規範化的政治認識層面成功地介入哲理化思維，從而在政治思想的理論分析和價值評判上形成全面深化，從個別的、零散的、具體的政治認識中抽象出覆蓋面更爲寬廣的概括性認識。這一領域的拓展不僅意味著研究的成果會更有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和認識的真理性，而且意味著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將會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實現“歷史爲現實服務”。

### (二) 政治思想研究的歷史過程化

相對社會和歷史的實際內容而言，思想是人的頭腦裏產生出來的，它的非實體性和非實在性是顯而易見的。研究思想很容易進入這樣一種狀態，即只關注思想本身的內容、結構和邏輯過程，忽略了思想與現實社會以及實際歷史過程的關係。就思想而論思想當然也很有價值，尤其是在認識邏輯和精神、信仰的層面，思想的分析無疑是解開人的心靈困惑的一把鑰匙。可是，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從思想本身來解析思想，而不能追蹤思想與其歷史過程的關係，這顯然又是一種更大的局限。

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發展、融合或沒落都必然與一定的社會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及歷史過程相聯繫，都是在具體的社會、政治環境和歷史條件中完成的；而且，與哲學、美學思想相比較，政治思想與社會政治現實的聯繫具有更強的緊密性。因之，脫離開歷史過程解析政治思想，雖說不無合理和必要，但畢竟與達到對思想的全面深入解析有一定的差距。爲此，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論域就要向著實際歷史過程擴展，介入到“實史”學的論域，包括諸如經濟史、家族史、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戰爭史、外交史等等。研究者從這些專門史的層面，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和解析政治思想，就會更準確地把握到思想家的政治認識形成的歷史軌跡，觸摸到政治理念及其思維脈絡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和制約，體味到在博大的政治思想背後更爲博大雄渾的歷史運作的推力。

具體言之，政治思想研究的歷史過程化要求研究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或是一種政治思潮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和社會條件中形成的，這種思想或時代的思潮又是與怎樣的歷史過程相互作用而發展變化的。爲了回答這樣的問題，研究者就要將視角轉向具體的歷史，從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追尋思想生成發展的軌跡，於是我們看到，政治思想的解析不再是單一的概念轉換或邏輯推演，而是紮根於人類社會的實際歷史過程，從而能更真切地認識到政治思想的時代性格，體味到蘊含其中的歷史韻味。

政治思想研究的歷史過程化將這一學科的歷史場景不斷延展，使得研究者可以將人類的政治思維放在一個更爲遼闊的學術背景上進行考察，從而避免了由於缺少歷史的定位而引起的認識偏差，使結論更加可信。

當然，思想與“實史”的互動也會令史家選擇新的角度研究歷史而有所助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 政治思想研究的世俗文化化

一般而論，政治思想屬於精英文化。思想家、政治家、政論家，無不是社會的精英分子，他們掌握知識，參與政治，制定規則，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精神、活動與行爲。如果說，精英集團及其文化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政治主體和主流文化，那麼，除此之外，還有與之相對應的廣袤的基層社會和亞文化層次。此二者之間的基本關係是，既有前者對後者的主導，也有後者自身的生成發展，和後者對前者影響與滲透。因此，單純的主流文化研究並不能涵蓋“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內容，完整意義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應當貫通文化的主流與亞文化層次。這就要求研究者將政治思想研究的層面擴展到世俗文化，從社會一般群體中和民間文化中搜尋政治思想的印跡。

這就是說，一方面，世俗的亞文化內容會對精英文化形成某些影響，我們可以舉出例證表明，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有時源於政治經驗的積累，有時則源於民間風俗或世俗生活的啓發。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對於世俗的亞文化也有著直接的引導作用，思想家們的提出的一些政治原則或政治標準，會逐漸演化爲社會意識，成爲普遍觀念，並且融入民風習俗，甚至會成爲某種政治迷信或政治信仰。這些問題恰恰是以往的政治思想研究所未能涉及的。

另外，在一個民族的非主流文化中，總會有一些不爲主流容納、不受主流影響的文化內容，這些文化內容基本維持著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在基層社會綿延流傳，構成了一個民族文化的另一番天地。恰恰是這裏面蘊含著的政治觀念或意識，對於社會一般成員來說，則具有極爲強勁的驅動作用。這些政治意識或觀念缺乏記載，不易考察，故而常被忽略。其實，這正是一個民族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爲，迄今爲止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是單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構成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果上述認識可以成立，那麼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們就要將研究的視野移向民俗學的論域，大凡原本不入流的世俗文化文本，諸如話本小說、謠諺俚語、民間傳說、族譜幫規等等都有可能成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依據。這樣一來，與其說是研究領域的擴展，不如說是一種新型的交叉學科的創新。事實上，人類的文化史與文明史已經告訴我們，新的知識學科就是在舊有的學術領域不斷開拓的過程中形成的。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豐厚，具有顯而易見的民族文化特色。這個民族曾經在歷史的長河中創造出了極其燦爛的文化與文明，曾經一度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最前列，爲其他民族所嚮往。“東方”、“中國”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曾經是些非常神秘的字眼，意味著智慧、富有和古老。然而，當西方人趁著一八四〇年的炮聲蜂擁而至，真的踏上了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時，他們看到的卻是愚昧、封閉和落後。他們搶掠財富，恣意妄爲，但他們仍然不得不爲中華文化的博大深邃所折服。進入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並且踏上了引向現代社會的發展道路。值此百業待興、諸務並舉之際，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民族特色，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由此我們想到，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學術領域之一，其中包容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積累下來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念。作爲歷史化了的政治思想，其中的許多內容已經與當今的世界不能相容，它們已經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被擱置在了歷史的甬道上。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成爲歷史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念之中，也確有一些值得今人回味與借鑒之處。同時，其中還有一些內容具有涵蓋人類文明的普遍意義，應當放到世界文化的祭壇上，奉獻給全人類。這就是我們回顧以往，展望未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領域勤奮耕耘過程中所能體會到的，這一民族文化的世界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n Overview of researches o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s mainland

***Quan Ge***

## Abstract

The political though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was established from 1920s and heretofore had a history nearly 100years. In this article I narrate its establishment and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I divide these research group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to three schools by their different methodology. These schools include: New Learning History, Marxism History and Modern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I introduce some representative men such as Liang Qichao,Lv Zhenyu and Xiao Gongquan; In the last, I give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in 21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thodology refresh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research areas.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New Learning History, Marxism History, Modern Polit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